

停企业、强退出、关路灯

警惕能耗双控在基层变形走样

“要想完成指标，恐怕只有停产”

眼下石油市场行情上行，各地开足马力生产。可北方一家煤制油分公司却冷冷清清，领导和职工愁眉苦脸，甚至向总公司发了函——申请停产。

“一周来三次，发改、能源、统计等部门一再要求、反复盯梢，让我们今年一季度能耗总量同比降低5万吨标准煤，可去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公司基本没生产，能耗基数较少，很难完成降耗任务。”这家煤制油分公司总经理张恒(化名)说，“有干部直言，‘实在完不成，停了得了’。”

这家公司的遭遇不是个例。“十三五”期间，一些省区未完成国家能耗“双控”指标任务，有的因排名靠后被国家发改委约谈和通报。2020年下半年以来，不少省区出台一系列政策，全力部署“十四五”和2021年能耗“双控”。有的从省区到市县、到企业，逐级向下分解能耗“双控”任务指标，相关部门和企业倍感压力。

相较于停产，更严重的是退出。最近，北方一个工业园区中的11家企业，由于矿热炉在25000千伏安以下，被纳入退出。“有的企业甚至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法规，只是为了适应能耗‘双控’要求，迫不得已退出。”工业园区分管相关工作的干部说，“11家企业面临退出，背后至少是1000人的就业问题，园区和企业都很为难，目前没有补偿方案。”

“双控”的触角也延伸到日常生活中。这几天，在东北一县城居住的王女士晚上不敢出门，因为当地政府下文要求，“全县所有道路路灯全天关闭”，“建筑亮化、企业及商户牌匾亮化、LED屏及路灯灯箱全天关闭”。王女士很无奈：“黑灯瞎火，开车和走路都很不安全，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夜经济也停了。跳广场舞、锻炼身体的人也少了，真糟心。”

“当前，各地、各行业正在积极研究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路线图。作为“双碳”工作的前奏，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成为推进倒逼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的主要抓手。然而，记者在多个能源大省采访发现，高压之下，个别地方火急火燎下任务、摊指标，不仅影响了企业生存发展，也给百姓正常生活带来干扰。业内专家呼吁，欲速则不达，各方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科学稳妥推进能耗“双控”，为“双碳”打好坚实基础。

记者采访时多次遇到电梯关停的状况。一栋五层高的政府大楼原本4部电梯运行，为降耗全部停运，干部职工整日爬楼梯，中午还得忍受大楼“集中停电一小时”。有干部直言：“能耗‘双控’本来是件好事，但如果连基本工作生活都受到干扰，就出问题了。”



“B” 猛烈“转型”带来“撕裂”之痛

能源大省既要保障全国能源供应，又要担起减排降耗的重压，其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面临巨大挑战。这其中既有积重难返的尴尬，又有任务压顶的焦虑，以及办法不足的无奈。

多年来，内蒙古、山西、陕西等能源大省立足资源禀赋，形成了以能源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内蒙古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高耗能行业企业占比近一半，能源原材料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87.2%。2020年，内蒙古单位GDP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且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占比高达80%。

“产业结构调整是必然趋势，但不可能一蹴而就。”能源研究专家姜艳波指出，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几年前就把相关工作铺开了，也不会造成现在火急火燎的被动局面。短期内急速降低单位GDP能耗、大幅削减能耗增量，不少项目审批上马将受限，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带来“撕裂”之痛。

作为我国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内蒙古仅

“C” 处理好降碳与发展的关系

“双碳”目标背景下，能耗“双控”与发展转型之困，是能源大省的共性难题。如何摆脱能源依赖、尽快实现转型？高耗能行业企业未来何去何从？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张永生表示，能耗“双控”和碳达峰、碳中和是对各地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特定的区域、行业和群体面临的机遇、挑战是不一样的，中西部能源大省面临的转型压力和成本会更大，甚至短期内会受到冲击。”

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俊峰建议，全国各地特别是北方地区一定要平衡好降碳和发展、转型和安全的关系，要在实现全面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下降耗减碳，避免“一刀切”关停企业。去年就出现过南方电力供应短缺等极端事件。不能影响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人民群众正常生活。

不少地方干部建议，鉴于能源大省保供应的定位使命，以及经济欠发达、发展不均衡的客观实际，国家要给予这些地区适度的转型时间和政策空间，

国家规划布局的现代煤化工示范项目和电力外送项目，能耗规模就达3500万吨标准煤。然而，业内人士预测国家下达的“十四五”内蒙古能耗增量不会超过3000万吨标准煤，用能指标缺口巨大。

据记者了解，基层干部想把事情干好，也深知用力过猛会带来后遗症。但在硬指标面前，惯用的简单粗暴招数看似最有效。一些干部对降能耗的研究不够，甚至理解为降能耗就是没能耗；对转方式、调结构思考不多，说来说去还是老调重弹；对高质量发展缺乏思路，大多都停留在表态上，关键时刻找不到抓手。

一位副县长坦言，对于那些属于产能过剩、限制类的项目，地方也不愿意它们淘汰出局，但怎样激励这些项目进行产能置换升级改造、开展兼并重组，甚至另谋出路，也没招数。

张恒等企业代表认为，要谨防能耗“双控”变“单控”，把降耗等同于降产能，一刀切关停限产，影响经济基本面。从近期市场反映来看，部分地区推进能耗“双控”过激，已波及一些高能耗上游行业的正常生产，造成煤炭、钢材、水泥、铜等价格一路攀升。

假网恋、真约会，见面就是买买买……

除了“酒托茶托饭托”，又冒出“衣托”

网恋“奔现” 见面消费2万多元

“我回家后连续4天都没联系上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湖北省十堰市王先生曾与网恋女友“奔现”，没想到短时间内就被套路走2万余元。

回忆起这段经历，王先生说：“都是爱情冲昏了头，没想到我竟落入了别人挖好的陷阱。”

30岁的王先生在某相亲网站发布征婚信息，随后结识一位名叫“小雪”的女子。刚开始，两人交流不多，直到2019年6月才逐渐熟络。闲聊中，该女子自称是湖北孝感人，与朋友在武汉市江汉区某商场运营一家美甲店。

在此后的网聊中，该女子向王先生讲述了更多关于自己和家庭的“具体信息”，两人“感情”随之建立起来。

王先生长期在外出差，社交范围窄，又到了适婚年龄，常被家人催婚，见“小雪”向自己吐露心声，感动不已。

2019年12月，从云南出差回来的王先生与“小雪”约定在武汉见面。

12月6日，两人在“小雪”工作的商场“奔现”。一见面，两人相谈甚欢，互相表露好感。不料，骗局从此拉开帷幕。

简单吃完快餐后，“小雪”拉着王先生的手一同逛街，最终散步到一家服装店。进店后，“小雪”先后看中两件外套、两款包包、一只手表，并不时对王先生开玩笑说：“你看，我穿这个外套好不好看？见你父母合不合适？”

为讨“小雪”欢心，王先生没有多虑，满口答应，支付16650元为“小雪”买下商品。作为回礼，“小雪”在店里购买一条600元的项链，亲手为王先生戴在脖子上。

离开服装店后，两人到附近喝奶茶。“小雪”对王先生委屈地说：“我皮肤不是很好，我怕以后见到你父母，他们会嫌弃。我看中了一套化妆品，希望你能送给我……”说着，她便给王先生发来一套价值4600元的化妆品购买链接。王先生一心疼爱“小雪”，便买了下来。为表谢意，当晚“小雪”主动请王先生吃饭。

12月8日，王先生返回十堰，之后连续多日都未联系上“女友”，这才醒悟自己被骗。

假网恋、真约会，见面就是买买买……与“酒托”“茶托”和“饭托”骗局类似，多起发生在武汉，以打感情牌、搞消费诈骗的“衣托”新骗局令不少受害者痛心疾首。

犯罪嫌疑人在相亲网站专找有消费能力的目标男子，假装与其谈恋爱。待“感情”稳定后，诈骗团伙派出“衣托女”与目标男子“奔现”(从线上网恋转为线下真实恋爱)，使用套路让受害人到指定服装店花高价购物。事后，“衣托女”再以各种理由与受害人分手。

令受害人难以想象的是，与自己在网上“谈情说爱”的犯罪嫌疑人竟不是见面的“衣托女”，而是陌生男性。



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江苏的舒先生到武汉市江岸区与一名在相亲网站认识的自称为“晓蕾”的女子约会。见面后，“晓蕾”便邀请舒先生吃饭、看电影。随后，舒先生为“晓蕾”购物花掉1.5万余元。两人分开后，舒先生多次联系“晓蕾”，但她每次都以“工作忙”为由推脱。感觉被骗的舒先生到江岸区派出所报案。

多起案件，套路雷同。民警从“晓蕾”“颖颖”等多个微信号入手调查，发现这些账号的真实使用者均是男性。民警分析，这是一起团伙作案、以婚恋为名的诈骗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在



团伙作案，分工明确

多个相亲网站冒充女性与目标男子网恋，通过在指定服装店购物、索要红包、借款等方式骗取受害人金钱。

经过调查研判，江岸区警方集中警力，分别到江岸区、江汉区等多个涉案窝点现场展开收网行动，共抓获团伙成员45人，查获涉案电脑19台、手机73部。

据介绍，该诈骗团伙内部分工明确，分别扮演“键盘手”“传号手”和“衣托女”等角色。“键盘手”以男性为主，在实施犯罪行为前期负责冒充年轻女性在相亲网站寻找有消费能力的单身男子，通过聊天建立感情，再以婚恋为名约受害人

“奔现”。

一旦有受害人上钩，“键盘手”会将男子信息、约会时间、地点以及历史聊天记录发给“传号手”。“传号手”负责将“键盘手”传回的消息告知老板，同时分配给“衣托女”。“衣托女”根据传回的信息，扮演成网聊对象和目标男子约会，并将受害人带至指定服装店消费，之后再将被购衣物送回，完成诈骗。

为防止受害人事后醒悟报警，该团伙诈骗得手后并不立即“拉黑”或删除受害人，而是以多种借口不再与受害人聊天，表达两人不适合谈恋爱。

“演技精湛” 赚得“盆满钵满”

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自2019年7月“开业”，靠诈骗赚得“盆满钵满”，作案1500余起，涉案金额500余万元。

“键盘手”刘某供述，指定服装店平时正常运营，按吊牌价打折出售商品，而对“衣托女”带来的顾客，售价则高出数倍。该团伙每次得手后，参与诈骗的“键盘手”可按诈骗金额提成40%，“衣托女”提成20%。

刘某入伙一个多月，谈成十几名男网友，通过“衣托女”线下约会，套路受害人消费4万余元，从中获利1.6万余元。

2020年7月，该诈骗团伙13人涉嫌诈骗罪被移送至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据检察官胡继宗介绍，涉案人员以“90后”和“00后”为主，文化程度多为初、高学历，以婚骗作为职业。

为扩大诈骗规模，该团伙把在武汉多地租用的住所打造成办公地，安置多台电脑供“键盘手”使用。

“键盘手”杨某供述，事前他们会在网上搜集美女图片，虚构女性姓名，再到一些婚介网注册账号，找同城、附近和省内的男性聊天。

为达到见面、消费的目的，他们一般会为自己虚构的女性角色塑造良好形象，并主动与目标男子谈缘分、聊结婚，借机“约会”。

胡继宗说，为防止漏出破绽，该团伙还提供专业培训，制定一整套专业话术供“键盘手”参考使用。如怎样假扮女性和目标男子聊天，如何在聊天过程中套取对方工作、爱好、家庭情况、择偶标准等资料，如何与目标男子建立“感情”，并将其约到指定地点见面等。

如果目标男子有饮酒、吸烟的爱好，为巩固两人“感情”，“键盘手”在日常聊天中还会偶尔“关心”受害人不要过度饮酒、吸烟。

对于一些消费能力强的目标男子，该诈骗团伙会“格外关注”。“受害人王先生开始陷入骗局的时候就被‘键盘手’做了备注，称‘这个人有钱，一定要想办法留住’。”胡继宗说。

2020年9月，江汉区检察院将本案起诉至江汉区法院。近日，法院判决下达，该团伙头目廖某被判判处有期徒刑3年4个月，其余12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至2年9个月不等。

(据新华网)